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①

——略谈《母亲》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

姜 力

一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称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为什么列宁如此高度评价这本书，说它“非常及时”呢？为什么列宁没有从这本书的其他方面来评价（尽管它无论从人物塑造、结构情节以至艺术语言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处），而单单强调它是“非常及时”的，那末，它又“及时”在哪些方面呢？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了解高尔基这部小说中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写作与出版这部作品时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作家又是怎样处理、描写和对待这些历史事件并“非常及时”地正确理解和完成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所提出的历史使命的。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一九〇六年在美国写成的，第一部单行本（英译本）出版于一九〇七年，那时轰轰烈烈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刚刚遭到失败，俄国正进入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时期，革命者大批被流放，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悲观主义、颓废主义、色情、梦魔等小说和戏剧大量出现。“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有一大群的时髦作家涌现出来，实行‘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

讥笑革命，赞美叛变行为，借口‘崇拜个性’而鼓吹淫乱”，^②当此反动年代，高尔基发表了反映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时期蓬勃发展着的工人群众运动的小说《母亲》，它宣传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对俄国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念，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的逃兵和叛徒的一个有力的批判。虽然小说结尾，两个主人公母子二人一个被流放，一个被逮捕，但它却以广大劳动群众的觉醒而告终，因而它给读者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革命必然要胜利！高尔基自己曾说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目的是“支持低落下去的反抗精神，来对抗生活中黑暗的敌对势力”。高尔基能在反动势力猖獗之际，通过小说《母亲》“及时”地回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革命是否能胜利，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易的。

当白色恐怖嚣张，动摇分子纷纷脱离革命的时候，高尔基却如列宁同志指出的那样“用他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把自己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③而正因为如此，高尔基能清楚地触

① 高尔基：《回忆录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第13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01页

到工人阶级的脉搏，并且透彻地观察到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他很了解，一九〇五年之所以能爆发革命，不但是因为工人备受高压，更主要的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而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程度还不高，尚需继续发动群众。时代的急迫要求就是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大力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们不但懂得革命一定能胜利，而且还要明瞭，怎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高尔基在这部作品里，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了工人阶级这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和历史必然，表明了革命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即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正因为小说《母亲》“及时”地提出了，并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列宁说：“这本书是必需的，许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会得到很大的益处。”^①而高尔基听到这一评语后，十分激动地说：“这是唯一的，但对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赞语。”^②

二

小说《母亲》所以能成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这不是偶然的。它不但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而且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需要的反映。但是，对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的认识远远不是那么一致的。这部作品不但从一开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禁止，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它才第一次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地、完整地与同胞见面，而且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也对它大加攻击和诽谤。如果它不是一株挺拔的青松，恐怕早已被无情的风暴所摧毁了。就连最早在俄

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对《母亲》横加指责。他首先从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竭力反对《母亲》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贬低这本书的思想意义及艺术成就，说它是一部抽象化、概念化的作品，除了机会主义分子外，一部分好心肠但不是彻底的马列主义文艺思想评论家也不理解《母亲》的深远意义，总觉得高尔基的这部作品虽然在政治上是为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服务的，但在艺术上是价值不高的。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这部小说多半是平空臆造出来的，说它类似宣传品，缺少历史的真实等等。对于这些非难和攻击，作者本人当时就做了回答，说明他是根据什么材料写出这部作品的。

高尔基在一九三三年给好友杰斯尼茨基的信中谈到《母亲》时写道：“还在尼日尼的时候，在索尔莫沃的游行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关于工人的作品，那时我就开始收集资料，并作了一些札记。萨瓦·莫洛佐夫把将近二十封工人们写给他的极为有趣的信给了我，同时又把他对工厂的观察中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告诉了我。”^③除此之外，当时高尔基手中尚有扎洛莫夫（《母亲》中巴威尔的原型）寄自流放地的书信和他的文学习作等。只可惜高尔基搜集的这些资料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后下落不明，据作者本人估计，很可能是宪兵搜查后未归还。虽然以上材料丢失了，但已记在脑海中的深刻印象是无法消失的。更何况当索尔莫沃五一示威的积极分子扎洛莫夫被关在监狱时，高尔基经常给他送饭，每月给他送钱，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又与其保持通信关系。

①② 高尔基：《回忆录选》，第5—6页

③ 杰斯尼茨基：《马·高尔基》，苏联文学出版社，1940年，俄文版，第263页

由此可见，作者早在一九〇二年，索尔莫沃五一示威游行和索尔莫沃党组织成员受审判等事件发生后，就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描写工人运动的作品的想法。因为高尔基和索尔莫沃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关心着他们所组织的每一个革命活动，并且熟识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者与其普通成员，因此，索尔莫沃的革命事件就成为作家构思《母亲》这部作品的基础与素材。而参加这次游行的扎洛莫夫母子彼得·扎洛莫夫和安娜·基里洛夫娜就成为小说《母亲》中的母子巴威尔·符拉索夫与彼拉格娅·尼洛夫娜的原型，所以，小说中的母子有许多地方与生活中的母子很相象，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人和真事。但小说《母亲》绝不是一九〇二年索尔莫沃城示威游行事件的翻版，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扎洛莫夫母子的简单拍照。

索尔莫沃的革命事件发生在一九〇二年，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写于一九〇六年，这中间经过了不平凡的几年。在此期间，高尔基经受了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洗礼，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与体会，并以社会民主工党对1905年整个革命过程的政策为根据，对索尔莫沃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间的种种事件（还有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前后后的一些典型事例）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成功地创作了这部划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高尔基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的典型人物巴威尔的形象，同时，更加细腻而深入地刻划了被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卷入运动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尼洛夫娜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过程。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高尔基如何通过艺术加工，以一九〇二年索尔莫沃革命事件

的积极活动家彼得·扎洛莫夫及其母亲安娜·基里洛夫娜的素材为基础，塑造出巴威尔·符拉索夫和彼拉格娅·尼洛夫娜这两个著名的形象，从而说明，小说《母亲》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以生活为基础，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要求。

彼得·扎洛莫夫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在回忆往事时曾谈起过，在十五岁时，为了参加革命组织曾多方考验自己，甚至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一样，用别针刺进自己的指甲，用滚水烫自己的手，还把钉子钻进自己的腿里一寸多深……当这种种肉体上的痛苦他都忍受下来时，这时，他才参加了地下组织。虽然扎洛莫夫本人就有非凡的经历，出色的品格，按说高尔基完全可以把这些突出的素材用到巴威尔的身上去，但作为艺术家的高尔基，他通过巴威尔着重表现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如何觉醒的规律和典型性，因此，作者放弃了这些动人的情节，而强调指出：“年轻人所做的一切，巴威尔都做到了。手风琴，浆过前胸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仗，一切他都买了。他变成和他同辈的青年人一样。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跳‘卡德里利’和‘波尔卡’式舞。每逢休息日，总是喝醉了回来……”^①就是说，在小说中，巴威尔起初与工人区的一般小伙子们并没有任何差别，他并非一开始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战士，更非高大、全式的英雄豪杰。

当他父亲一死，他立即习惯地走上了父辈的老路。他之所以走上这条崎岖小路，并非因为喜欢它，而只是因为尚未找到一

① 高尔基：《母亲》，夏衍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14页（小说《母亲》中的引文均摘自夏衍译本，但对照原文稍有改动）

条应该走的光明大道。因此，一旦革命的书籍擦亮了眼睛，他立刻就懂得掌握这些理论的重要性，并对自己的母亲讲：“我要学习，然后再教别人学习。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我们必须知道，必须懂得，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苦。”^①正因为巴威尔懂得了这一点，所以他迅速成长为工人群众的领袖，组织了著名的五一游行。

扎洛莫夫在回忆一九〇二年索尔莫沃五一示威游行的情景时曾说：当他手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头，与前来镇压他们的兵士相遇，枪柄从各个方面落到他身上，然而，他并不感到疼痛。他在回忆起自己如何挺胸昂首地迎着兵士的刺刀前进时写道：“这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这一素材，被高尔基如实地写入小说《母亲》中去。作者以四章的篇幅描写五一游行的前前后后，同时，他把这一事件摆在小说第一部的结尾，使它成为第一部的高潮，这都是用意颇深的。作者希望通过游行示威的群众与敌人面对面斗争的场面，展示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一伟大真理。参加游行的人就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主力军。手擎红旗率领大家前进的勇士，不难使人想起作者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掏出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道路的传奇式英雄丹柯。而紧跟在他身后的群众队伍“象一只黑鸟，宽宽地张开了两只翅膀警戒着，随时都准备飞起……”^②作者将这一队伍描绘成自由高飞的鸟儿。尽管面临敌人的屠刀，但挺得住、站得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决心埋葬旧制度的，有如燃烧着的丹柯的心。作者笔下的五一示威游行，不但现实主义地描述了索尔莫沃工人游行时的英雄主义，而且巧妙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将工人阶级浩浩荡荡的斗争队伍与敌人搏斗的场面显得更为雄壮，更为动人。示威的领袖巴威尔比现实生活中的

彼得更为高大。因为他不仅自己英勇地与敌人战斗，而且团结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组织他们去斗争。

巴威尔在法庭上演说的场面是全书的高潮。巴威尔作为工人领袖的完美的性格，成熟的政治家的头脑，在法庭发言中充分地显示出来。可以说，这段演说不仅是工人学习小组的总结，同志们实际斗争的总结，而且是未来的行动纲领，它对工人群众指出了前景和方向。高尔基深刻而又有说服力地塑造了巴威尔在法庭上完整、高大的形象。而这一重要情节也不是作者虚构的，事实上，彼得·扎洛莫夫一九〇二年在法庭受审时，也同样地与敌人进行过斗争，也发表了演说，但发言的内容则偏重于当时工人在经济方面的要求，这比起经过艺术加工，政治概括后的，又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巴威尔的发言来，要逊色得多了。

彼拉格娅·尼洛夫娜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本书中非常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形象。全书的事件、人物和活动都是围绕她发生的，透过她的眼光出现的，经过她的工作完成的，通过她的评语与读者见面的。可以说，小说《母亲》主要描写的是这位女主人公的成长。

尼洛夫娜最初只是十九世纪末一个普通工人胆小怕事的妻子，后来，由于儿子的关系逐渐接近了工人学习小组，不自觉地参加了一些儿子及其同志们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最后，终于在马列主义的启发下，真正地觉醒了！母亲从什么都怕，到什么都不怕，从只知道爱自己的儿子，到“工作”（即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小说最后以尼洛夫娜在车站被捕时英勇的斗争结尾。

① 高尔基：《母亲》，第20页。

② 高尔基：《母亲》，第228页

这样的母亲难道在生活中没有吗？有的！她的原型就是安娜·基里洛夫娜·扎洛莫娃。在一九三四年，这位革命的老母亲仍然健在，那时她大约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但仍头脑清晰。她谈到高尔基的《母亲》时说，她很久以前就读过《母亲》这部小说，而且早就听说有一个作家把她的儿子和她本人写成这本书的主人公。同时，她还想起了年轻时她就认识未来的作家高尔基，那时，作家还是个小孩子，因为那时安娜·基里洛夫娜常常到高尔基的外祖父卡希林家的染坊去。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参加过的很多革命活动，如散发传单，五一示威等等。她讲的许多往事，很象我们在小说中读到过的情节。作者将基里洛夫娜的这些经历大同小异地写进了小说《母亲》，其中大部分写到母亲尼洛夫娜身上，但某些细节也写到别人身上。如五一示威后，基里洛夫娜把写有标语的旗子裹在身上送到同志们那里去，而在小说里却成了莎馨卡衣服里裹满传单和小册子了。

除了在塑造巴威尔和母亲这两个形象时，作者利用了许多实际材料外，在描写农民革命者雷宾，革命知识分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娜塔莎和莎馨卡等人物时，也同样是采用了原型身上一些特点的。就连巴威尔与莎馨卡相爱，安德烈爱上娜塔莎这些爱情关系的描写，也与实际生活有关。彼得·扎洛莫夫是个工人，而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高尔基关于小说《母亲》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大约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给一位女读者的信中曾说：“事实还不是真理的全部。为了写一个僧侣，大约必须要接识五十个僧侣。”接着，高尔基又举出许许多多妻子和母亲追随丈夫和儿子参加革命的事例。由此可见，小说“母亲”绝不是平

空臆造出来的，但同时也不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简单纪录，而是作者根据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间，发生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大量真人真事，经过高度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从而更具有典型性。

一九〇七年，高尔基在伦敦出席社会民主工党五次代表大会时，在会议休息时，工人代表们对《母亲》谈得很多，他们都非常欢迎这本书，但其中有些人认为，书中描绘的一切比生活中要美好了些。尽管高尔基从来重视群众对他的作品的反映，而且主动、虚心地征求和听取意见。可是这一次，他却热烈地与工人们争辩说：“人同生活中不正义的事物作斗争，其表现总是美好的，所以也应该是美丽的”。^①高尔基通过自己大量的创作实践，还总结出应该怎样描绘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他说：“不仅把人描写成现有的模样，而且描写成将来所应有和必然会有 的模样”。^②艺术作品按高尔基的理论，它“不是酷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③高尔基忠实地遵循列宁的一贯教导，在艺术领域中需要从未来的角度观察今天，因此，他就能以革命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事物与人物。因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未来是光明而美好的，所以必须在它还未完全成长起来时，就抓住这一事物的本质，表现这一事物的未来，这才是艺术的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中心人物尼洛夫娜和巴威尔就是这一时代群众革命精神的体现。高尔基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创作发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不仅常见的性

① 《列宁与高尔基》(书信、回忆、文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307页

②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181页

③ 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册，第66页

格可以成为典型性格，而生活中罕见的性格也同样可以成为典型性格，因为它能够代表整个的时代精神。

小说《母亲》中的人物雷宾关于尼洛娜就说过这样的话：“跟着儿子走，走儿子走的道路，她大概是第一个吧，是第一个！^①”正因为这“第一个”代表了整个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她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虽然她在当时是“第一个”，但她很快就会带动起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直到出现成千上万这样的母亲。小说《母亲》所以能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本质与需要，正是由于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作用于生活。

三

人们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高尔基写出了这样“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呢？然而就是高尔基本人在早期作品中也只接触到这一主题，并未能解决它，只有在1905年后才能写出这本书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分析以下情况。

在高尔基以前的作家，俄国的也好，西欧的也好，也都有人写过工人题材的作品。比如俄国六十代的作家列舍特尼可夫，在他的作品里描写过工人；我们在杰出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作中也看到过工人的形象；还有著名的俄国短篇小说家契诃夫的短篇中也反映了工人的生活，等等等等。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工人阶级都不是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出现的。这些作家只写出了工人的痛苦生活，描写了他们悲惨的境遇，把工人只写成值得同情，值得怜悯的人，而不是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新兴阶级。十九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往往也试图刻划一下劳动者，也反映了些他们

作为个人对社会的反抗行为。一场激烈的阶级搏斗被写成所谓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更有甚者，将工人群众的现实生活写得一片消极、落后、悲观、颓丧。连自称为社会主义作家的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以及左拉的《萌芽》，都偏向于描写工人阶级消极落后的方面，他们没有看到时代所赋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针对这一问题，恩格斯曾批评过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指出作家没有理解“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一理论原则，而且作家也不理解当时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与要求，因而就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正确地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正面人物。当然，这些作家在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上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什么？工人阶级的典型人物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应该怎么办？走什么路？如何改造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等这一系列问题，过去，在世界文学史中是不曾有人解决过的。只有高尔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才在《母亲》一书中，第一次以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因此，它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和奠基石。

在高尔基以前的作家，没能写出有如《母亲》这样一部不论从思想内容到创作方法上均有创新的作品，这里存在着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在那些作家写作的时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当然很难写出类似《母亲》这样的作品。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作家，他们也可以算作高尔基的同时代人，虽然从事创作要比高尔基早一些时间，但也经历了一九〇五年革命，这中间有些人甚至是艺术大师，世界文豪，他们写出了无数批判现实主义的好作品，可是由于他

① 高尔基：《母亲》，第283页

们的出身、经历,特别是世界观的局限,同样也不可能抓住时代的本质,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方向。

而高尔基则不同,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个革命者。自从他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以来,很快就积极地投入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仅从一八八九到一九〇一年这短短十余年中,他就三次被捕,经受了无数革命的考验。一九〇五年,与列宁同志相识后,在革命导师的亲自关怀与帮助下,又成为一名以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从一九〇二年起,高尔基便与《火星报》发生了联系,从这时起高尔基即已坚定地、旗帜鲜明地、牢牢地站在列宁的《火星报》一边。一九〇五年对作家的政治思想和文艺创作成长上都是关键的一年:不但火热的革命斗争对他的创作起了重大作用,而且还有一系列因素对他的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年,高尔基由于一月九日事件又一次被捕,在这一年,列宁发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高尔基在彼得堡第一次会见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同年,高尔基光荣地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因此,不是别人,而正是高尔基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写出了小说《母亲》这样的好作品,也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我们还必须看到,高尔基也只有在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后,于一九〇六年底才写出《母亲》这样的作品。尽管高尔基在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曾出色地创造了一系列流浪汉的形象,如切尔卡什、柯诺瓦洛夫以及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等。这批流浪汉身上虽然某些因素与巴威尔相似,可他们远远不是巴威尔。因为作者曾亲身在俄罗斯的“底层”生活了很长时期,所以他非常了解和熟悉这类受苦人的生活,而在描写这些人时,也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

和支持。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他们身上还有一些属于资本主义残余的东西无法摆脱,因而,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下场,他们无力摧毁旧世界,创造新生活。

在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作者企图依靠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解决那些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不易解决的问题。作者企图通过浪漫主义形象解决上述社会矛盾,使人民大众见到光明,得到解放。由于作者本人当时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作者希望有,而且感到了,但尚未具体地认清真正的、切实可行的通往解放的大道。于是,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牺牲自己解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丹柯,继而出现迎着暴风雨勇敢翱翔的海燕。这些象征性的革命形象是生动而可贵的,但终究不是现实的,而只是寓言式的前景,他们离生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二十世纪初,高尔基写了一批著名的剧本,如《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和《仇敌》等。这些剧作,特别是在一九〇六年与《母亲》同年完成的《仇敌》,都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家不仅暴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同时还提出了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来改造世界。“谁劳动,谁就是主人!”“权利不是谁给的,权利是争来的”——这是《小市民》中的火车司机尼尔的名言。他是俄国文学作品中(也包括世界文学)首次出现的一个革命无产者的形象,这也是作者在以后塑造巴威尔形象的道路上的第一步。从这时起,在高尔基的创作中,浪漫主义的丹柯式的英雄,就开始让位于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英雄——尼尔式的人物了。这类英雄相信资产阶级社会必将灭亡,劳动人民将是社会的主人。这一思想在《仇敌》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个剧中,剧作者不但表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

借厂长的弟媳塔吉扬娜之口预言工人一定会胜利。“这些人一定会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世界文学史出现的奇峰，它表明工人已不只是受屈辱的奴隶，而是旧社会的摧毁者，是未来的主人，这个思想与《母亲》中的思想一致。剧本中所描写的罢工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在地下布尔什维克辛佐夫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与《母亲》中的主题更为接近了。所以说，高尔基在《母亲》以前的许多优秀作品中，虽然未能解决《母亲》中所涉及到的一切问题，也未能创造出象母亲与巴威尔那样完整的革命者形象，但它们都给创造《母亲》打下了有力的基础。做到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从一九〇〇到一九〇六年间，由于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不但给高尔基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大大地鼓舞了高尔基的创作激情，他的创作不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几年的创作高潮中，高尔基平均每年都有两部大型作品问世。

在这些年里大量的创作活动中，这位初登文坛即显示出艺术才华的作家，一方面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批判地继承了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大胆地进行艺术革新，这些都为小说《母亲》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不是别人，而只有“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才能够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写出如此出色的作品《母亲》。

四

正因为小说《母亲》是一部具有鲜明党性的作品，所以从它问世起，就引起两种完全不同的反映：广大劳动群众说它好得很，可各国反动派则说它坏得很。彼得堡的工人在读到这部小说以后，纷纷给高尔

基写信，谈自己的心情与体会，对高尔基表示“钦佩和工人的真挚的谢忱”。这部小说几乎立刻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法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瑞典文、丹麦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等等，以后又译成亚洲各国文学。在我国它也广为流传，中译本问世后，它在一年之内就接连出了两版，而且多年来一直是畅销书。鲁迅先生曾指出：“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现译为“非常及时的书”——本文作者注）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①

革命人民对这部小说越爱，反动派对它就越恨。一九〇七年，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向它的上级报告说，这本书中“引人注目的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完全的，明明白白的同情”，因此，这个作品具有“完全罪恶的性质”，因为它“煽动叛乱”。当时曾刊载这部作品的杂志被查封，铅版被销毁。高尔基后来为了使这个作品能与俄国读者见面，不得不忍痛同意删去小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当然使作者很伤心。但即使如此，沙皇政府还不肯罢休，它的出版委员会要求审讯高尔基，如果作家当时不是居住国外的话，他就要被判刑服苦役了。我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把小说《母亲》宣布为禁书，而且对这本小说的读者也大加迫害，许多进步读者，因为读了这部宣传真理的小说而被判刑。

“四人帮”则不但对小说《母亲》，而且对高尔基本人进行攻击。他们公然宣称，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个空白阶段，就是说，列宁亲自肯定过的高尔基，毛主席赞扬过的鲁迅等也都不是革命作家了。“四人帮”一伙施展其“抓住一点，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卷，第235页

不计其余；咬住一口，无限上纲”的惯用伎俩，把他们“打倒一切”的大棒竟直接挥向高尔基。一九七五年，他们炮制了一篇《走出“彼得堡”！》的黑文。他们抓住高尔基在一个时期产生的一些思想错误，利用当时列宁对高尔基有如“严师益友”般的一些批评，加以扩大歪曲。把高尔基说成已动摇向反革命一边，就差没扣上一个“叛徒”的帽子了。江青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对高尔基要“倒过来看”。在他们煽起的阵阵妖风影响下，很多地方写文章、出大字报批判高尔基，说他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说他的《母亲》是宣扬人性论的一株大毒草，只因为在小说中巴威尔向母亲讲真理这一段中，母亲对巴威尔说过：“你要当心啊！”这么一句话。于是就认为这是宣扬人情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时有些地方竟把《母亲》列为禁书，有的高等学府的领导明令禁止把《母亲》选入教材。

然而，无论是各国反动政府也好，包括“四人帮”在内的各种修正主义也好，他们对小说《母亲》的污蔑攻击，不但丝毫不损于它的光辉，而正好从反面证明这本书对革命对人民的重大意义。小说中所阐述的一系列问题：如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这些年来，都是“四人帮”一伙搞乱了的问题。他们制造了大量谬论，拼命鼓吹自发，反对学习革命理论，不要人民学习文化科学，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反对知识分子与工

农的真正结合等等。

上述一系列根本问题，不但革命导师们一再阐明过，而且列宁同志之所以肯定这本书是“非常及时的”，主要也正是由政治角度出发的。当然，就是由文艺角度来讲，《母亲》也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但要建设一个新政权，同时也必须要有一个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文艺创作原则又应该是什么等等，都是摆在无产阶级作家面前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就由高尔基以自己的小说《母亲》为典范很好地解决了，因此，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小说《母亲》中的一些创作原则不但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就是在今天，它的现实意义也是显著的。如高尔基笔下的母亲与巴威尔性格的逐渐发展而完美的规律性，就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一伙要求英雄人物一亮相就必须高、大、全的形而上学观点。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就不在这里一一地列举了。

由此可见，就是在今天，这部小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读读这部小说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益处”的。不管反动派怎样禁止，要从革命人民的“心里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一本书。”正象母亲在小说结尾时高声喊出的：“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灭不了的！”